

□ 朱 舟

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不仅反映了 50 年来中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消费结构不断转换的状况,也是中国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现实,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意图的集中表现。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分阶段分析,提出建国 50 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些有益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从产业调整的重心、手段及未来主导产业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对 21 世纪的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展望。

关键词:工业产业结构 重工业化 存量调整

作者简介:1972 年生,女,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一国的产业结构集中反映着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国经济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发展道路选择等重大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新中国 50 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消费结构不断转换的状况,也是中国政府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意图的集中表现。

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回顾

由于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与过去长期经济变动的各项因素密切相关,在对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进行回顾之前,有必要简要说明结构调整的逻辑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旧中国的产业结构体现出明显的殖民地经济形态,经济资源和产业发展主权为外国资本垄断,中国的产业体系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产业体系的延伸。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后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使近代半个多世纪的殖民地形态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根本扭转。下面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 50 年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作一简要回顾。

一、中国经济恢复期的产业结构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及工业生产经历了 3 年经济恢复期,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三次产业的比重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在此期间,主要做了两项工作:(1)1950 年进行了工商业调整,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调整产销关系,实质上重组了部门间投入产出联系和工业再生产的分工秩序。(2)追加投资,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这一时期,第三产业(主要为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到 1952 年,工业再生产过程中新的结构关系初步建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部门间投入产出关

系的重组,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再生产联系大大加强。

在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的1952年,中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一时点也是我们分析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开始。根据结构调整中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将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分为传统体制下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

二、传统体制下的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较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大致可分为:

(一)“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产业结构

提高新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为尽快步入工业化阶段打好初步基础是我国“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在工业领域,集中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通过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和建立新的基础产业以及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新中国产业结构的完整性,许多重要产品自给率明显提高。到1957年,我国钢材自给率达到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达到60%以上。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到“一五”期末,产业结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46.9%上升到1957年的56.7%,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7.3%上升到1957年的45%。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体现为工业产业结构完整性和独立性提高,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投入产出联系基本建立。

(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1965年)的产业结构

从1958年开始,“大跃进”使工农业比重发生了较大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大大增强,工业增长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持,工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调。重工业的孤立增长换来了表面的经济持续增长,却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并将结构失衡因素由表层推向深入,为以后重复出现的低效的增量—存量周期性调整埋下了伏笔。重工业的过快发展,也造成农业和服务业投资不足,并直接导致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业结构被迫大调整。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先农后工、先轻后重、先生产后基建等工作调整,重建产业间、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平衡关系。其后,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恢复,工业产业结构有所调整,尤为重要,此次调整触动了存量结构。针对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情况,一些长线产业(主要是重工业)的企业被“关停并转”,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短线产业(主要为轻工业和以农业生产资料为需求对象的工业)。在调整时期,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有所提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从“大跃进”时的13%提高到20%,使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等有了较大发展。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先进性提高的时期。1958—1965年,我国建设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自1963年起,农轻重逐步进入同步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又一次重新启动。但僵化的行政方法和缺乏利益机制诱导的缺陷的存在,使此次存量结构调整未能消除造成原有结构失衡的根本性问题。

(三)“文化大革命”及其后两年(1966—1978年)的产业结构

自1966年5月,中国开始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产业结构进一步刚性化,强化了结构失衡问题。农业长期缓慢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65年农业产值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37.27%迅速下降到1978年的27.81%。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钢铁工业、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1966年,轻重工业产值比为1:1.03,到1978年,上升为

1:1.31。重工业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进行自我循环,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同期发展缓慢。从社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1965年商业和运输业的产值分别占社会总产值的7.1%和3.4%,到1978年下降到6.4%和3.0%。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

(一)产业结构关系的第二次全面调整(1979—1985年)

1979年,国民经济开始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全面调整。其中,产业结构调整包括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调整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1979、1980年两年,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轻工业内部生产和产品结构也发生变化,顺应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要求。同期,重工业的内部结构得到了改造,为轻工业及农业服务的产品生产有所增长,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状态开始改变。

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由比例关系的调整转入了更广泛的改造。1982年9月,农业、能源、交通部门以及科学技术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1979年到80年代中期,我国轻工业产值的增长和结构调整,与社会货币收入提高的相关性逐渐增加,表现为以家电为主的新兴耐用品工业的大发展。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渐由1978年的43.09%上升到1985年的47.44%。在这一阶段,我国选择战略重点产业部门的依据由速度转变为比例关系。能源工业作为我国当时影响国民经济及工业发展的最薄弱环节,被列为战略重点部门加以发展。同期,产业部门结构的封闭体系开始被打破。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了稳定的对外开放过程,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对工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体系起到了越来越大的平衡和调节作用。

通过这次调整,我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部门各自封闭生产,以及工业内部重工业自我循环的结构初步扭转,产业间、部门间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大为加强。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更为我国产业部门结构在吸收国外经验、引进国外资源和实现国内市场延伸的基础上,进一步彻底改造提供了动力和可能。

(二)再次重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1985年至今)

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产业结构进入了再次重工业化时期,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所回升。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调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这是这一阶段重工业化与建国后前30年重工业化的重要区别。同时,工业内部结构出现高级化趋势。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行业的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行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内部的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同方向的变化,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这种变化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换。

1996年以来,我国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摆脱了短缺经济性质。面对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绝大多数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压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再是解决短缺和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问题,供求结构失衡问题成为新的工作重心。结构调整更多地是通过调整资本存量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采用企业间的兼并、收购、联合等资产重组方式进行。

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探讨

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都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激化相关,而结构矛盾又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僵化的供求结构平衡机制和“赶超”政策运用不尽合理的具体表现。在

世纪之交,总结 50 年来的产业体系的发展与演进,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认识中国产业结构转换模式的选择空间是十分必要的。

一、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传统体制下,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并未得到重视。长期以来,第一产业的发展受“赶超”政策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影响,自我积累与自我投资的功能十分薄弱,导致了农业的缓慢增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迟缓扩张和内部结构的迟缓分化必然限制经济总量的有效扩张和结构演进的速度。另一方面,工业占中国国民经济的比重偏高,该比重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类似。但由于我国未能形成产业间有效的经济传导机制,工业生产加速扩张和几次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也都未能对农业内部结构变动、集约化水平和要素转移形成后向引导作用。第三产业则长期未得到重视,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在相当长时间内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一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改变,但第三产业的比例过低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且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构成落后、基础薄弱。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产业结构问题必须同经济发展问题结合起来解决,只有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才可使产业结构获得有序的发展,才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路径选择

新中国工业化伊始,经济建设和投资方向就明显地表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基本国情的。以重工业加速扩张为契机的结构转换,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下的畸形产业结构约束的历史起点,也是新中国产业体系步入非平衡发展轨道,存量失衡与增量涨落交替循环的开端。

1. 重工业投资扩张引起的外延式扩张和产业波动,始终未能促成积极的产品和产业周期,以加速产业分化和重组。低技术水平的最终投资品需求(主要是重加工部门的设备需求)刺激低技术水平的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增量扩张基本上是对原产业结构状态的重复。

2. 数量扩张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超稳定状态。其明显的标志是:第三产业直到 80 年代中期才在市场因素的推动下逐步从第一、二次产业中分离出来,而在此之前,除商业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产业功能以外,其他都只能加重第一、二次产业的运转负荷;重工业的部门增长效应往往集中于重工业内部,对于其他产业的正向关联作用则很小。

3. 技术进步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产业体系未能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通过前后向关联形成技术进步——需求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正向循环。技术进步水平低,限制了最终消费品需求结构变动的空间和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度,使最终消费品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各自维持低水平循环,并通过前后关联,维系整个产业体系的低水平循环。

因此,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违背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不顾实际国情,过分突出重工业,破坏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基本比例关系。

三、产业体系低水平发展问题

从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和现有存量体系的结构水平来看,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未能摆脱低水平发展的不良循环:

1. 农业仍基本停留在传统耕作方式上,工业体系则表现为高能耗、高物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在我国,资本和劳动投入贡献率达 90% 以上,其中物质资本贡献率大于 75%,而 TPF 贡献率仅为 5.46%。

2. 产业技术水平低下,未能形成自我创新的产业技术体系。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资金积累和技术竞争的压力,短缺经济更使消费结构附属于产品供给结构,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存量资产中先进技术的含量低。

3. 中国产业体系的低水平发展是赶超战略的产物,需通过存量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低水平的产出结构和效益低下的问题在短缺经济下被掩盖,但当我国各产业面对开放的经济环境和迅速提高的消费结构时,产业体系的低水平发展就使我国很快面临行业竞争力差、比较优势弱、竞争优势低的被动局面。

四、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存量调整

中国赶超型发展的产业结构转换,首先是对资本积累过程和技术进步累积效应的超越。重工业主导型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关联特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强烈感应,决定了结构变动大多与增量扩张相伴进行,存量结构却难以对经济增长作同步反应,即存量结构变动滞后于增量扩张。体制缺陷更决定了中国的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消极后果,而不是对产业高度化趋势和市场结构变动的常规反应。我国历次产业结构调整都没有着力于存量结构严重失衡的现实本身,而是采取增量调整方式。增量调整的初始效应一般比较明显,只需较短的调整时滞,便可实现数量均衡。但是,随着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的加速,增量调整逐步异变为数量扩张的“助推器”,旧的存量结构矛盾尚未解决,由数量扩张形成的新的增量结构矛盾又沉积下来。

五、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当确定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体制,经济计划和产业体系的政策制定者和行为主体是国家。高度集中的决策方式使结构调整的模式和方向完全取决于国家对当前经济政治形势的判断和对经济信息的理解把握。调整过程忽视国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等基础因素的影响,长官意志高于经济规律,易于出现信息误差导致的调节失误。我国传统体制下的产业结构的几次重大调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以后,在增量投资方面,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基建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各级地方政府取而代之。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和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漠视,投资权力下放直接导致了区域经济同构化。以往的经济实践说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资源配置优化,要求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成为结构调整的主体。

六、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企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并不就此否认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应用产业政策及各种经济手段,引导企业的投资,为企业提供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尽可能明确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各自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具体地,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起到方向性指导的作用,在涉及产业退出和产业援助等企业难以负担及社会成本较高的调整活动时,政府还应起到结构调整最终支持者和市场失灵修正者的作用。

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景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

目前中国正处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在向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迈进,同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工作还远未完成,与发展知识经济密切相关的知识产业更是处于发展初期。由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重叠进行的时期,中国仍要靠多元化的结构变动和多种产业并行发展来保持较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在这一过程中酝酿形成一个能带动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

有增长潜力的“主导产业群”。这一时期,在中国将出现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的广泛展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结构层次的升级。中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重化工业方向倾斜,把高技术、高加工度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全面提高产业素质和实现产业升级。同时,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大大缩短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将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全国性市场,使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国民经济的二元性矛盾逐渐缓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加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的转变,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出现第三产业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的趋势。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转移

在短缺经济结束后,面向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心发生了明显变化。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的调控从主要着力于增加产量转变为更注重对部分行业实行总量控制,特别是对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实行限产、压产。近期纺织业中的棉纺、毛纺和丝绸以及煤炭、钢铁、建材、炼油等被列入重点控制(限产、压产)范围,这就反映了这一趋势。从鼓励增产到实行限产、压产,突出地表明了政府对工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着力点和政策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对于各地区以至整个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竞争优势则发挥着越来越强的作用。目前,我国经济与工业比例失调的局面已不是主要矛盾,全面提高产业素质和实现产业升级,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这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推动我国产业技术体系的优化和自我开发创新能力的形成,这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高加工度化的技术基础。

三、产业结构调整的手段发生变化

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调节的产物,而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经济效率和经济资源配置合理化为目标的自主活动,与此相应的是,消费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应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拉动力。政府投资政策从主要将投资作为生产驱动力逐渐转变为更注重将投资作为需求拉动力来进行政策调控。信贷政策从主要着力于支持生产转变为同时也注意鼓励消费。

四、21世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主导产业的选择

到21世纪,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工业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比重。但是,由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将逐步完成由数量扩张向素质提高的转变,加上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下降。到21世纪中期,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将从1978—1997年间的66.3%下降到50%以下甚至1/3左右,而来自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将逐步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必须与资源配置优化、提高素质与效益等工业目标相结合,才能保证这一转换过程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21世纪前期,石油化工、机械汽车、电子信息、建筑等支柱产业将成为增长较快的行业,交通、水、电、煤气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将成为投资重点,产出份额略有增加,而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份额相应下降。此外,后发工业国的优势也使我国能在一些高科技产业有所作为,包括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等产业,用新技术、新设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将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并注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旅游业、环保产业等。在此期间,最终需求的增长和变动只影响到工业总产出增长的一小部分,工业增长的大部分依靠中间需求的增加而带动。在这一加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源约束、劳动力转移以及对高速经济发展

的要求,中国不能不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并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同发达国家进行直接较量。

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和内部结构优化也将成为 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吸引外资、鼓励服务类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应成为中国第三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途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提高本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并能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

作为人口大国,人口增长和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转换都需要农业在 21 世纪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存在和发展,稳定农业、使农业提供食物能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此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要求农业实现产业化和现代化,为其提供劳动力、市场和重要原料。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从农业自身的结构调整来看,农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持续下降。同时,农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农业内部行业结构也将有较大调整,种植业产值有所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比重将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1. 周叔莲、王延中:“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工业发展及对策”,《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2 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发展”,《中国工业经济》1999 年第 5 期。
3. 王岳平:“十年来我国工业部门结构变动分析”,《管理世界》1998 年第 1 期。
4. 龚仰军、应勤俭:《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5. 何诚颖:《中国产业结构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6. 江小涓:《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7. 石磊:《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换》,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8. 金碚:《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9. 陈准:《工业部门结构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10.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5 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单位邮编:200433)

姜尔行主编《基础会计新编》

列为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我校博士生导师姜尔行教授主编的《基础会计新编》一书,最近已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会计新著共分 12 章,计 30.7 万字。本书作者将“基础”的涵义具体理解为“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操作技术。因此,本书着眼于帮助读者掌握好“三基”,而不主张对初学的读者离开具体方面而抽象地论述某些会计理论,但在涉及基本概念时,则力图阐述清楚。

本书已列为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尚才)